

古詩今選



程千帆 沈祖棻 選注



古詩今選

上 冊

程千帆 沈祖棻 選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詩今選

下 冊

程千帆 沈祖棻 選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诗今选

(全二册)

程千帆 沈祖棻 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1.25 字数 489,000

1983 年4月第1版 1983 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4,500

统一书号: 10186·366 定价(六): 2.10 元

前 言

在伟大祖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诗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今天文艺科学的概念说，诗歌的样式并不限于过去被称为诗的作品。以汉语诗歌而论，周代的四言诗、汉以来的五七言诗，还有历代为数不多的杂言诗，本有诗名，固然是诗，而许多当时另有名目，并不叫作诗的作品，如辞、赋、词、散曲、时调小曲、鼓书、弹词之类，也都是诗的一部分，只是它们的成就不同，因而在文学史上所占的比重也各有不同。

单就传统概念的诗来说，由于四言诗的盛行时期远在周代，汉魏以下很少有人写四言诗，所以五七言诗是诗歌中流行得最悠久和最广泛、作品最丰富的样式。从汉代到现代，它们一直为广大作家所喜爱和熟习，经常加以运用。从汉到宋这一千多年当中，更是其最盛行的时代。祖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流诗人基本上都是用五七言诗这种样式来写作的。

这部小书，就是由汉到宋的五七言诗的一个选本（按照传统习惯，也包括了一小部分六言诗和杂言诗）。因为这一部分遗产异常丰富，这里所选的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从这少数的作品里，依然可以看出祖国古典文学这一组成部分的巨大成就。

和整个古典文学相一致，五七言诗中的优秀作品也是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富有特色的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的或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的高度统一为其基本特征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

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我们在学习古典文学的时候，首先应当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出，卓越的诗人们总是针对着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社会矛盾，以人民的或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的立场，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地、艺术地反映着各阶级阶层的生活的。因而这些作品放射着进步思想的光辉，洋溢着艺术的魅力，使人们受到鼓舞和教育。

例如：许多篇章反映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充满了对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同情，也充满了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的憎恶。这就激发了广大人民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为改变现状而进行斗争的决心，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作用。

例如：许多有关妇女问题的作品，比较广泛地反映了由宫廷到农村各阶级阶层的妇女生活，揭示了古代妇女不仅和多数男子一同受着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还单独受着夫权的压迫这一生活真实。如我们所熟知，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诗人们对于妇女问题的强有力的呼吁，以及由之而引起的反响，就不能不动摇着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

例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一向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诗人们把人民的愿望反映在创作里，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反抗民族侵略和压迫、歌颂民族英雄的诗篇，以及斥责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反对不义战争的诗篇。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祖国各族人民热爱和平和正义的高尚情操。

此外，诗人们还歌颂了普通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这些优良品质，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和诚挚的友谊，歌颂了祖国雄伟壮丽的山河，歌颂了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其在政治、军事、艺术各方面的成就。这一切，都能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为广阔和深刻，使人们对生活更加

热爱。

事实上,五七言诗所表现的进步思想,其内容是非常丰富、复杂的。从对阶级斗争比较正确的反映一直到对风景的优美感受和对爱情的健康描绘,都应当包括在内。当然,作品的题材有大有小,有重有轻,不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但如果把它们孤立起来,认为彼此并无关联,那也是不妥当的。在人民的生活中,这一种健康的感情与那一种健康的感情之间,这一种美好的事物与那一种美好的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内在联系。

祖国古典文学中所体现的进步思想是古代人民先进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思想感情的结晶;而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体,生活构成了作品的内容,借以表现这些内容的则是艺术形式。每个民族,由于它各有其表现于民族文化特点上的不同的精神形态,各有其民族特点、特殊性,因此,适应着每个民族生活的独特内容,也就有其文化上的独特形式,即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是每个民族广大人民所创造出来的。它们在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且和在长远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民生活相适应,因而为这个民族的广大人民所喜爱。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化、宣传等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民族形式的重要性,并指出,不能“离开中国特点”。

语言是文学的根本材料。民族语言就是文学的民族形式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它将文学的民族形式固定起来,赋与它以生命以及风格、气派等等。祖国文学从古到今,由于各族人民所具有的高度创造性,拥有非常丰富多采的民族形式。它们通过各民族语言,异曲同工地显示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五七言诗是我国汉语文学民族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五言诗和七言诗都起源于民间歌谣。远在周代,在一些民间劳动歌曲和抒

情歌曲中，已经出现了五言句和七言句；到西汉时代，就有了整篇的五言诗和七言诗。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作家们开始注意并且利用这些从民间来的新样式来从事创作。其中一部分，还配乐歌唱，和入乐的民间创作同样被称为乐府诗。由于当时入乐的主要是五言诗而非七言诗，而作为歌词来流传对于诗歌的发展又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汉、魏、晋、南北朝、隋时代（单就汉族政权来算，就是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简称八代），五言诗就成为最盛行的诗的样式。七言诗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从唐代起，它才达到与五言诗并驾齐驱的程度。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精练和最富于形象性与音乐性的语言之一。汉代的人民利用这一根本材料创造了五七言诗，使祖国文学中增加了这一优美的样式。但他们的后代并不以自己的祖先所已经达到的成就为满足，到了齐、梁时代，作家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利用汉语的某些特点，进一步试行创造一种规律谨严的诗体，就是所谓律诗。律诗在唐代称今体诗，后来又称近体诗，表示和以前的古体诗，即原来规律不太谨严的五七言诗及杂言诗有所区别。

律诗是一种具有许多规律的诗体。它的构成，基本上要具备下列一些互相关联的条件：第一，全篇均须以双数的五言句或七言句组成，不能长短参差。第二，每篇除了起头两句、结尾两句而外，中间各句一定要用对偶的句法，即每两句构成一联，其词汇、语法大致上要一样。第三，以语音声调中的平声和仄声为基础，建立了有规律的韵律。句中某字必须用平声或仄声，某字可以自由使用，都有一定。第四，在整篇的声律上，每四句构成一个单元，每八句体现一次相间相重。因此，律诗一般都是八句，即两个声律单元。用两个声律单元以上写成的较长的律诗，则称为排律。第五，除了第一句押韵与否可以看情况决定而外，只有逢双的句子才能押韵，而且必须押韵。第六，所押的韵，都要是平声字，而且全篇必须一韵到底，

不能中途更换。

要完成这样一些规律，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实践过程。因此，从唐代起，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才正式出现。在唐以前，完全符合这样一些规律的作品是不多的。齐、梁以来的许多诗作，大体上，乃是古诗和律诗之间的桥梁。在一篇诗中，常有符合了这一条规律又不符合那一条规律的情况。这些作品，主要是五言诗，标志着古体的律化过程。这种诗，后人称之为新变体。

每篇只有四句的五七言小诗，从汉以来就有了。五言四句是南北朝民歌——吴歌、西曲、北歌——的基本形态。由于当时诗坛上流行的一种风气，使这种五言小诗获得了绝句的名称。原来，晋、宋时有一种几个人共做一篇诗的风气，其办法是每人做四句而将它们联成一篇。联成功了，就叫联句；联不成功，或者没有人联，结果只有四句，就叫绝句或断句。于是，在古诗、律诗之外，又有了绝句诗。

随着古诗的律化，多数绝句诗也走上了律化的道路。律诗一般是八句，而绝句诗则是四句，它恰好是半篇律诗。唐代人称律化了的绝句为小律诗，就是这个缘故。律化了的绝句，一般也要遵守上述律诗的规律，除了不一定要用对偶的句子，也不可能体现声律上的相重。

由上可知，五七言诗细分起来，又有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六种（习惯上，人们把不很发达、为数较少的杂言古诗和六言绝句也附属于五七言诗的体系中）。它们从汉代开始创造，到唐代才全部完成，大大丰富了古典文学的民族形式。

古典诗歌还有一个创作方法问题。所谓创作方法，就是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选择和表现的方法。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于反映生活是容许并且鼓励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的，但是它有一个总的特征，就是要求作家们对于现实生活不加粉饰，对它的选择和表现要严肃、深刻和具体。生活是怎么样，就把它写成怎么样。这

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家们把握现实中已经大量存在的和正在萌芽的客观事物及其发生、成长的规律，并按照它们在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去观察和描写它们，才能使作家们看出和写出生活中的一切具有社会性质的矛盾，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使自己的肯定无可争辩地变为读者的赞扬，使自己的非难同样无可争辩地变为读者的否定。当然，这一种真实而又正确地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能力，是和作家们先进的世界观紧密地联系着的。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那些具备一定程度的先进世界观的作家，只要认真看待生活，就首先会看到这一最普遍和最根本的事实，因而他们的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成的作品，就不能不以揭露那些不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关系为其基本任务，即以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为其基本任务。

人民在憎恶那种黑暗与丑恶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必然也就会产生希望改变那种现实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思想感情，不仅作为一种客观要求而为作家所认识，也往往作为一种主观愿望而为作家所具有。由于生活中存在着这种客观要求，作家自己也具有这种主观愿望，于是就有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之以真实地再现现实为其特征有所不同，这种创作方法是以生活应当怎么样，就把它写成怎么样为其特征的。它所反映的生活、思想、感情并不脱离现实，但又高于现实。作家先进的世界观同样驱使他们通过鲜明的夸张手法，传达出自己的激情，驱使人们加强其生活意志，唤起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和未来的展望，对于一切不合理的存在的抗拒。它使得作品中发散着乐观情绪，从而使得广大人民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种种困难，而依然能够勇气百倍地继续向属于自己的未来奋勇前进。

这两种先进的基本创作方法是一对亲密的双生姐妹，它们彼此决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虽然由于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差

别，有的作家和诗人主要是现实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中没有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同时，有的作家和诗人主要是积极浪漫主义者，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中没有现实主义的因素。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一个作家的身上，甚至存在于一篇作品当中。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这些伟大诗人的创作，就可为这一情况作充分的证明，虽然多数人公认：杜甫和白居易基本上是现实主义者，而李白和苏轼则基本上是积极浪漫主义者。正如同不能狭隘地对待古典作家和诗人作品中的进步思想一样，对他们的创作方法也不可以作机械的划分和简单的理解。这里所谈到的，只是其中两种基本创作方法。

古代诗人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阶级，他们的思想感情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的作品也存在着许多和我们今天思想感情不符合、有距离，甚至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同时，他们或者由于受到种种冷遇迫害、排挤打击；或者有机会较长期接近人民生活；或者受了前辈进步思想家、作家的影响，等等，也就使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一些变化，写出进步的、反映出人民的愿望的、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作品来，因之他们所拥有的高妙的艺术手段更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评经济浪漫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部小书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八代诗，第二部分是唐诗，第三部分是宋诗，因为五七言诗的发展，八代、唐、宋是三个最主要的各有特色的历史阶段。不可否认，金、元、明、清都出现过一些很有成就的诗人和传诵人口的诗篇，但总的说来不如八代、唐、宋三个阶段之富有创造性和代表性。加上我们对金元以来的五七言诗研究得非常不够。所以编选工作，就以由汉到宋为限。

从八代诗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五七言诗出自汉代的民间歌谣。西汉武帝(刘彻)时，设立了一个管理音乐的政府机构，名叫乐府(这在以后形成一个传统)。采取民间歌词，配上音乐来歌唱，是乐府工作的一部分。入乐的歌词，便称为乐府诗。这样，民间诗得以被记录整理，流传下来。乐府诗的样式非常复杂、变化多端，大体上可分为杂言和五言。有些作品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焦仲卿妻》可算是最杰出的代表作。

在乐府诗的影响下，东汉末年大动乱局面的前夕，《古诗十九首》以及其它一些无名作家的作品在诗坛上出现了。它们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中的抒情之作而加以发展的，所写男女恩怨、友朋离合之情，深挚生动，和民间创作相去不远，却加上了生活在动乱时代的苦闷，对个人出路的不满等等内容，表现手法比较含蓄宛转，打上了文士生活情调和美学观点的印记。这些作品，历来被认为是五言古诗的典范。

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军阀大混战使人们生活起了剧烈变化，也开创了诗坛的新局面。以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献帝刘协年号)诗人，在创作上，一般都具有“慷慨任气”的特征。他们关心动乱中广大人民的生活痛苦，并希望建功立业，澄清天下。这使得建安时代的诗作，比起《古诗》来，显得题材丰富，境界广阔，风格豪迈。这都是进步。建安诗人以曹植为代表，他的作品有较华美的色彩、较和谐的音调、较工整的对偶，还有较鲜明的个性。曹操、曹丕以及刘

桢、王粲也都是颇有成就的诗人。

魏末的阮籍把五言抒情诗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八十二首《咏怀》以丰富的想象与巧妙的比喻集中地展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处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斗争的漩涡里，既不满曹氏的腐朽，又不满司马氏的专横。他怕惹祸，又不肯沉默，结果就写下了这些难以一眼就看懂的诗来。《咏怀》所反映的思想感情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反抗现实的积极面，又有逃避现实的消极面。阮籍这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集中于内心世界自我表现的抒情手法，对后代诗人有较大影响。

西晋统治集团极其腐朽，一些出身于上层社会的诗人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使诗歌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到了东晋时代，统治集团又将其在剧烈的民族斗争中的失败情绪与苟安思想带进文学领域，从而产生了宣传老、庄思想的玄言诗。这都是一些逆流。西晋初年的左思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是这一历史时期中不受逆流干扰而有独特成就的诗人的代表。此外，西晋、东晋之间的刘琨、郭璞也是很有成就的诗人，可惜他们留下的作品很少。

左思的代表作《咏史》反映了在门阀制度形成后，统治阶级内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诗篇以高昂的笔调，向那班一无所能而只凭借门第占据高位的权贵投出了鄙视，咏史也就是咏怀。

陶渊明是曹植以后，李白、杜甫以前最重要的诗人。他生活在司马氏的晋朝与刘氏的宋朝交替的年代，对这种改朝换代没有好感，因此长期隐居。他曾经亲自参加劳动，对农村生活，对普通农民，都有感情，写出了不少赞美自然风光，描写农耕生活的诗篇。他并不完全忘怀现实，所以在诗中还有对反抗者、复仇者的歌颂，对于理想中的没有剥削的社会的向往。陶诗语言十分简洁，风格极其自然，能把深刻的思想感情用平淡的诗句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来。他的这一切，都和当日诗坛上流行的风气相反，所以并不被同时的人所

珍视。唐、宋以来，他才逐渐被多数人所了解和肯定。

宋、齐时代，玄言诗发展为山水诗。这种诗以具体的山水描写和抽象的玄理论述相结合为其特征，仍然是为统治阶级的消极思想服务的，其代表作家是谢灵运。同时，声律说开始出现，奠定了后来律诗的基础。最初从事于这种新变体诗的实践的，有沈约、谢朓等人。其中谢朓的诗清新流丽，很有情韵，高出同时的其他作家。

鲍照略后于陶渊明，也是当时杰出的诗人。他出身比左思更其寒微，所以诗中有和左思同样的不平之鸣而又更为激烈。他的诗声调激昂，色彩强烈，动人心目。杂言诗在他的手中，发展到汉代民间创作以来的最高程度，而成为李白等人的先驱。

梁、陈时代，盛行宫体诗，即以色情生活为内容、华丽语言为形式的堕落文学。这是反动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反映，毫无价值可言。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卓越的诗人。

北朝与隋朝的文学风气大抵追随南朝，没有什么特色。只有一位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比较突出。他在屈身北朝以后的诗、赋中所流露的身世之感，异常动人，杜甫曾大为叹赏。他还对七言律诗和绝句在形式上的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

东晋、南朝及北朝的民间口头创作有不少流传下来，艺术水平都相当高，风格则有显著的区别。南方民歌多写儿女情怀，风格温柔；北方民歌反映的内容比较广泛，即使是写爱情的，风格也显得刚健。《西洲曲》与《木兰诗》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南方民歌与北方民歌的代表作，虽然它们可能被文士们作过一些修饰。

从汉到隋这八百年当中，诗歌已经相当发达，某些作家和作品的成就很高。到了唐朝，诗苑之花开得更为茂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又都超过了八代。根据清代及近代所搜集的还不够完全的现存资料统计，唐朝三百年中有诗家二千三百多人，诗作约五万篇。

唐帝国建立以后，采取措施，恢复生产，迅速地走上了政治安

定、经济繁荣的道路。但唐初的诗，还沿袭南朝齐、梁以来浮艳的余风。到了高宗李治和武后时期，王勃、卢照邻、宋之问、沈佺期等一些诗人，才有意识地摆脱因袭的重担，从色情、宫廷等黄色无聊的题材中解放出来，将视野转向较为广阔的生活，同时，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萌芽于前代的律诗、绝句以及七言古诗等样式也得到完成、巩固和传播。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陈子昂。他打出了反齐梁、学汉魏的旗帜，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陈子昂是唐代现实主义诗风的奠基者。

开元、天宝时代是唐帝国的极盛时代，但内部矛盾也日益增长起来。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从此唐朝就开始衰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诗，就是指的开元、天宝时期的诗人们反映当时各种复杂尖锐矛盾的作品。

盛唐诗有两个有代表性的主题，边塞和田园山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长久以来都是和睦的邻居，但由于统治者的贪婪和野心，彼此之间不时也发生侵略和抵抗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在各族人民居住地区的分界线之间也就各自设置了工事，配备了兵力，大概地说，这就是唐人诗中所谓的边塞。在唐朝，各民族之间战争比较频繁。诗人们往往根据直接的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创作以边塞战争生活为主题的诗篇，来表达自己希望为国效劳，建功立业的心情。所以这类诗，往往表现出他们入世的、进取的精神状态。古代诗人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失意以后，总还可以回到家乡，收租过日子。诗人们对田园山水的咏歌，既显示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爱好，又往往在不同程度上透露了自己不甘心于无所作为但却无可奈何的心情。所以这类诗，往往表现着诗人们出世的、恬退的精神状态。这两种精神状态往往并不是分别存在于不同的诗人身上，而是自相矛盾地存在一个诗人身上。这种情况，在杰出的诗

人王维的作品中表现得很鲜明。王维在四十岁以前,写过许多风格豪迈的描写边塞风光、歌颂英雄人物的诗篇,以后却隐居在辋川别墅里过着闲适的生活。幽美的山水、宁静的田园,伴随着孤独的心情,不断地从他笔底下流露出来。王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不论是雄伟的还是幽细的景物,都能刻画传神。他善于捕捉生活事物特征,通过细节描写,构成独特的意境。这在他的一些小诗中更为突出。

孟浩然、储光羲等也是当时长于歌咏田园山水的诗人。而以长于描写边塞著名的诗人则还有王昌龄、李颀、高适、岑参等,都写出了不少名篇。岑参曾在西域军队中生活过一个时期,他的边塞诗显示着更强烈的地方色彩,更多的具体性与真实感。王昌龄对七言绝句极为擅长,用这一样式成功地写出了许多传诵后世的边塞诗与宫怨诗。后者,用委婉含蓄的手法,深刻地揭发了在绮罗珠玉重重包裹之中的残酷与黑暗,丰富和提高了有关妇女问题的诗篇。

盛唐的边塞诗人和田园山水诗人都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虽然往往带有消极倾向。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诗人则是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者李白。李白是屈原的继承人。

李白诗歌的思想价值主要表现在对于封建社会秩序的对立,对于统治阶级作为诱饵的功名富贵的蔑视,对于有才能的人在昏庸的权贵压制下被迫无所作为的愤慨。一方面,他有儒家“济苍生”,“安社稷”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的“遗世独立”和游侠的“功成身退”的精神。他把这些思想材料加以熔铸化合,在创作中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独特精神面貌。他曾经努力于政治活动,但由于他的性格和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始终一事无成。他被迫而漫游,隐居,求仙,最后还落到被贬,可是他毫不屈服,而是继续向他认为是合理的社会挑战。因此,这些强有力的思想感情表现在他富于魅力的诗篇中,就不能不成为人们去争取美好生活的一

种巨大的、积极的鼓舞力量。

李白说他自己“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杜甫赞美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都很形象地勾画出了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李白有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经验，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交结过各阶级阶层的许多人物，他的诗篇中因而呈现了繁复的画面，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变幻莫测的结构、精工而又自然朴素的语言，无例外地表现在他创作的各种样式的诗作中，虽然后人认为，他的七言古诗和七言绝句的成就尤其卓越。李白的叛逆性格、自由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段，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进取的精神，增强了反对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这使得他成为祖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杜甫是和李白同时，在创作上却走着不同的道路，而在成就上与李白达到同样高度的伟大诗人。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少年时代就有忧国忧民的抱负，希望能够通过正常的进取道路，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是，安史叛乱粉碎了他的希望，使他在穷困和流离中度过了艰难的一生。他的生活实践使他看出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奢侈荒淫和腐朽无能，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使他的创作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的光辉。痛斥当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渴望“各使苍生有环堵”，即广大人民能够得到和平安定的生活，是他诗篇中最可宝贵的感情。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同情交织在一起，他深刻地观察了并且勇敢地、真实地反映了安史叛乱前前后后的社会现象。这些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诗篇，被后人尊为诗史。

比起前人来，在更其广阔的范围内和更其深刻的程度上面对现实，忠于现实，不加粉饰地反映现实，使得杜甫的诗歌将《诗经》及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是杜甫现实主义的根源。他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描